
从语言生态看语言与贫困的作用特点及路径

张先亮 席俊杰 王倩¹

【摘要】 贫困作为全球“三 P”(pollution 污染, population 人口, poverty 贫困)问题之一,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当下,我国正从“脱贫攻坚”迈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发展阶段,迫切需要我们正视和思考语言与贫困的相互作用及路径,以便更好发挥语言在“乡村振兴”中的特殊功能。语言生态系统强调重视语言系统和外部环境系统的相关性,作为一种有机整体,语言系统不仅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还能反作用于外部环境。从语言生态视角来看,语言和贫困主要是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各相关因子作用的联动和叠加,使语言生态与贫困的运动呈现双向性、层次性和隐蔽性的特点。

【关键词】 语言生态 乡村振兴 语言与贫困 作用特点 作用路径

前言

贫困作为全球“三 P”(pollution 污染, population 人口, poverty 贫困)问题之一,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它关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常是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导火索。随着全球经济科技的发展,贫富差距呈扩大趋势,其严峻性更加凸显。

当下,我国正处在从“脱贫攻坚”迈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发展阶段。就全国而言,绝对贫困虽已消除,但相对贫困仍然存在。2020 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答记者问中指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 3 万元人民币,但是有 6 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 1000 元,1000 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¹,这一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而 2021 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以上群体的收入比上一年度每月增加了 47 元。²这也说明在我国,相对贫困远未解决,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别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离“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还有较大距离,迫切需要我们正视和思考语言与贫困的关系,弄清两者的作用特点及作用路径,这对改变贫困有着积极意义,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

语言与贫困涉及因素很多,两者并非具有直接的决定性关系,而更多地存在于语言外生态系统之中。贫困作为社会经济的相关因素与语言相交于语言生态的自为环境系统,相关于自在环境系统,通过人群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等环境系统和自然结构环境系统相互作用。其中人群系统在语言与贫困相互关联中具有中介功能,自在环境系统的自然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为语言与贫困的交互影响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联系场所。

语言生态系统重视语言和外部环境的相关性,语言系统不仅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还能反作用于外部环境。这种系统性使语言与贫困相互作用,众多因子参与其间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作为一种有机整体,语言生态系统去掉其中任何一个相关环节,这个系统就会解体。³本文从语言生态视角探索语言与贫困的作用特点及路径,以期对两者运动关系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为改变贫困贡献“语言之力”⁴。

¹作者简介:张先亮,浙江师范大学语言生态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席俊杰,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通讯作者王倩,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金华 321004)

²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语言生态研究”(16AYY004)成果

一、语言与贫困的作用特点

（一）双向性

对于语言和贫困存在的生态系统来说，每一种结构都包含着众多的因子，每种因子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语言。各因子作用力的方向和大小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因子在不同的时空下也会有所差异，并不是每种因子对语言都有同方向的作用力，也不是任何时空条件下作用力的大小都能保持恒定。各因子间的这种交互性影响所产生的正向性和负向性作用力，使两者的运动具有一定的双向性。

1. 语言多样性与经济发展

语言多样性与贫困交互影响，并非是单一的线性关系，两者受政治、经济、文化、人群等要素影响呈现出一种双向性的作用力。语言多样性兼具正负两个方面，既可提升经济活力和人群系统的和谐，也可阻碍经济的发展和人群的交流。

语言多样性意味着交流的非统一性，通过影响经济要素的流通，与贫困呈现负相关。如井上史雄通过考察世界各个地区的夜晚照明情况后发现富裕地区人口密度高，夜晚照明度高，人们晚上可以相聚，方便交流，语言就趋于单一化；贫困地区，交际密度稀疏，语言趋于多样化。⁵美国学者普尔也指出“一个语言极度繁杂的国家总是不发达的或半发达的，而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总是具有高度的语言统一性。”⁶这就是著名的“费希曼-普尔假说”。语言多样性容易阻碍专业人员流动、增加管理成本、妨碍新技术传播等，从而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这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

语言的多样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经济和文化价值，与贫困呈现出正相关状态。奥塔维亚诺⁷、吉尔斯·格雷尼尔⁸分别探究了美国、瑞典语言状况与经济发达的关联性，他们为语言多样性的经济收益提供了定量证据，得出语言多样性在提高社会成员福利、增加产品数量和类型、提高工资水平等方面都表现出积极作用。这些都说明语言多样性具有特殊的益处，不仅不会导致贫困，反而是经济发达的表征，它可以通过促进社会和谐为经济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语言多样性与贫困的正负相关性多体现于通用语与方言的协调上，如目前大部分的城镇化研究都倾向于方言多样性对经济发展具有阻碍作用，对城镇化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不能忽视那些掌握了较好的通用语却仍旧贫困，还有那些保持着方言经济却高速发展的例子。前者如美国城市郊区或者中国城市郊区的一些贫困区，特别是所谓的“贫民窟”，许多居民可以说很好的通用语，但是仍然处在贫穷状态；后者如香港、广东、福建等地，许多居民依旧保持着粤方言、闽方言的单语状态，但他们早已摆脱往日的贫困状态而进入了温饱或小康的生活。⁹方言在经济发展中，有时能为本地和流入人口建立起同城镇同身份的意识 and 价值观，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纵观所有的发展实例，语言多样性对经济的双向影响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地域及拉动经济的侧重因素不同有关。通常在经济发展前期，语言统一性的经济效应更明显，而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语言多样性的潜在价值给经济带来的“增彩”作用便凸显了出来，如认同感和归属感。但语言多样性的适宜性会因人群和地区特色出现差别。对有些地区来说，这种单一性和多样性可以很好地共存，而对有些群体来说，语言外生态系统的歧视、思维、制度因子的影响更大，即使拥有多样的语言能力，也因面对的发展机遇不平等而沦为贫困群体或者无法摆脱贫困状态。

2. 语言能力与经济发展

语言能力包括两个层面，即内在的语言能力和外在的语言能力。¹⁰语言能力的提高不仅是一种量变的过程，如增强现有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而且还是一种质变的过程，如由方言能力到普通话能力、由国语能力到外语能力的提升。语言能力与经济发展相互影响，同样呈现双向性特点。

语言能力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双向性。劳动者语言能力的提高可以通过增加就业机遇、提高职业技能等获得更好的收入。如陈媛媛¹¹、金江等¹²分别动态跟踪调查了全国部分家庭和广东省内部分家庭的普通话能力与劳动收入，均显示普通话能力对非农收入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说明语言能力的提升对经济状况的改善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也存在着提升语言能力后仍处于贫穷状态，而选择维持现状最后获得了较好的经济发展的案例。比如美国的许多西裔移民努力提升自己的英语能力，甚至超过了白人，但仍然深陷贫困；处于社会中下层的西班牙吉卜赛人以罗姆语为母言，不少人努力学习加泰罗尼亚语（西班牙经济富庶、文化发达区域的语言）以望改变经济状况，但既有维持罗姆语的富翁，也有掌握加泰罗尼亚语的流浪汉。¹³ 语言能力与经济发展并不体现出一种单向的相关性。

经济对语言能力的提升也具有双向性。优越的经济条件可以为语言能力的提升提供好的学习条件、学习氛围、学习资源等，但优越的经济并非一定会创造出语言提升的机会，更不用说有了好的机会就一定会学有所得。比如高收入家庭孩子的语言能力发展并非一定是正向的，因为父母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穷于应付，无暇顾及孩子，家庭温情和关怀的缺失容易导致孩子语言能力得不到正常发展。而经济贫困的家庭却因生活节奏舒缓，父母有更多的时间与孩子相处，从中获得较多的话语交流，也能提升精神世界，使思维得到发展，从而有利于语言能力的提高。

语言能力与经济的发展呈现双向性，主要源自语言能力的经济身份具有双重性，以及评价语言能力高低的审判机制具有社会主导性。前者主要表现为语言能力在具有收益性的同时兼有成本性，后者表现为语言能力的经济效果总是以当下特定的生产水平为评审机制。对于当下经济来说，语言能力对生产作用值的大小，可能在众多因素中占据主导性地位，但也可能是非必要性地位，不过人们通常会认为学习了社会主流或前端语言才是获得了更高水平的语言能力。目前大多数的语言地位评判是站在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制高点，对人是否真正拥有或提升能力并不一定具有一致性，因此，不同的审视机制决定了语言能力的不同地位。

3. 语言权利与经济发展

语言权利通常指习得和使用母语的权利。母语权利的保障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如母语教育可以促进扫盲和职业发展，从而有利于消除贫困。¹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组成员斯库特纳布·康尤其倡导母语权的理念，在她看来，母语权利是一种不可剥夺的人权，母语教育促进儿童成长。¹⁴ 的确，母语具有文化之根的性质，个体会因其与自身语言文化机制的吻合而更容易获得，是提升语言能力的有效途径，可以快速提高自身的素养和能力，从而利于从业，获得经济发展。但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语言权利更多的是作为人权平等的附属品在加以强调，母语权利代表着一种对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的尊重。

与此同时，对母语权利的片面强调可能会使经济发展受限，使这种语言权利成为不平等人权的一部分。比如非洲土著人民的母语权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和尊重，但他们并不感激甚至极力抵制。其原因是主导者以语言权力的尊重和保护划定了语言教育种类，由此限制了他们的语言选择和发展。目前已有人将语言权利视为分化和隔离种群的一种手段。¹⁵ 有些以消除贫困为由而施行的片面保护或开发小族群语言资源，可能反而成为新时期的另一种隐性的殖民方式。

从社会公平来看，各类语言都是平等的，但市场价值和法律地位是不对等的，语言权利不仅包括母语权利，同样也包括学习国家和国际通用语的权利。对有限范围语言的强调，实际上是通过阻止语言与外界生态系统间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为语言发展套上了枷锁，从而限制了这一弱势群体对社会发展福利的获得。真正的语言权利的平等，不是从表征上划定语言使用权利的范围，而是尊重人的语言选择和发展权利。

4. 经济发展与贫困体验

语言与贫困关系的双向性还同经济与贫困关系的非单一性有关。从某种角度看，经济获得发展，贫困可能得以消除，但也可能没有消除，甚至增加了贫困状态。这与贫困本身有关，贫困是相对的，同时也是多方面的。

贫困是一个相对概念，因比较而凸显。经济的结构类型和发展方式使得经济活动限定于特定的层级，在未发生结构性改变、未获得质的飞跃时很难突破既有发展水平的跨度性体验。如相对于美国人来说，墨西哥人则显得贫穷。他们的发展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美国人处在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分工系统中，能低成本地生产大量商品，实物工资水平也就上升了，墨西哥则完全相反。¹⁵在国内也一样，相对于东部，中西部比较贫困，但在中西部也有很多富裕的，同样在东部也有些贫困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多阶段性质，贫困既可以定义为生存性物质缺失，也可以定义为未达到社会发展低中等水平等，因此要想改变贫困需要先弄清发展改善的目标和性质。

此外，贫困的内涵也具有多面性，既有物质贫困，也有精神贫困。一方面物质的发展与精神世界的发展并非亦步亦趋，很多人虽然经济收入增长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可精神世界日益枯竭堕落；另一方面，精神上的富足与否和每个人的价值追求有关，也与社会存在的状态有关。比如一些地区年收入低于联合国划定的贫困线，似乎很贫穷，但其生活模式很和谐，感觉很幸福、很满足，他们没有现代城市人的精神贫困。像不丹，虽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低，可国民幸福指数很高，生态良好，社会安定，这样一个“小国寡民”的世外桃源，没有受到全球化的巨大冲击，语言多样性保存良好。¹⁵

（二）层次性

语言系统是由与它相应的自为、自在环境系统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其内部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中。这种运动和变化不是随意的，是受到各相关要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一种层次性特点。如威廉姆斯曾从两个层面绘制了语言因素导致的贫困循环图。社会文化层面的贫困循环路径为贫困→教育劣势→发展劣势→贫困。社会经济层面的贫困循环路径为贫困→就业劣势→经济劣势→贫困。¹⁶值得注意的是，各系统中语言和贫困的作用路径并非是单一的和唯一的，其中位于基础性地位的是自然系统，位于核心地位的是人群系统，而社会结构系统则是语言和贫困生态运动的动力。

1. 自然结构是基础

自然资源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语言和贫困生态运动的基础。它为语言系统提供众多的材料，影响语言的表达方式，同时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物质保证，影响其发展的模式。

自然结构形成的广阔背景，给语言系统提供了无限丰富的信息宝库，是语言生态系统的物质基础。³比如英国人常用泰晤士河来比喻，中国人则常用黄河来比喻，因为两者都是各自的母亲河。在中国，自然地理特征造成了南北方地名的差异：南方多山、多水，所以南方的地名中多带有“塘”“岭”“桥”“埠”等词，有些就直接表示山清水秀，如兰溪、丽水、青田、碧湖、仙居、仙都等等；而北方一望无际的平原，缺水少绿，所以地名中多带有“屯”“沟”“窑”“庄”等。自然结构系统不仅影响着语言的表达方式，并且以信息的传输和反馈为纽带，调节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调节着语言自身与人的关系。

自然地理不仅为语言系统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要素，同时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同的自然要素往往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平原具有发展种植业的优势，高原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山区在发展林业、旅游业和采矿业等方面具有优势，沿海地区则为海洋产业和对外贸易提供良好条件。

2. 社会结构是动力

以自然结构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社会结构，其经济因子、文化因子牵引着语言生态系统的发展变化，是贫困和语言生态运动的动力，这种动力来自于现实的需要和未来的愿景。

语言和贫困具有时代性特点。社会经济、文化的现状和发展共同牵引着语言和贫困按照一定的要求和方向做出合理的改变。如山东青岛受地理位置及历史背景的影响，旅游产业日益发达，随着境外游客，尤其是日韩和欧美游客的增加，其经济发展成为

当地迫切提升各类外语能力的动力，包括英、韩、日、德等语种。浙江义乌也一样，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外籍人员不断增多，促进了当地各类人群的语言提升。这些正是社会的需求拉动了语言和经济的发展。

语言和贫困同时也面向于未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多地区开始实施面向未来的人才引进和培养政策。这些城市和地区着眼于未来，积极规划经济发展蓝图，人们也根据未来发展积极提升自己的相应素质，包括语言能力。如广东积极迎接人工智能和体验经济的时代，为打造中国的“硅谷”而推出了一系列经济和人才政策，形成了以需求为导向、用人单位为主体、市场配置为机制的国际人才资源新格局，为经济和语言发展提供了动力，指引了方向。语言和贫困内在的相互关联性是间接的和多样的，我们在看待两者间的生态运动时，除了向内看，还可以向外看。它们的发展都需要关照时代的要求和未来的愿景，当各自的发展都合乎时代、合乎未来，彼此必会相得益彰、共同促进。

3. 人群结构是核心

人群结构是语言生态系统中的自为环境，是贫困与语言生态运动的核心，因为在语言生态系统中，人群是语言系统与自在环境系统的中介。语言内生态系统要想从自在环境获得物质、能量和信息，必须靠自为环境系统充当物质、能量和信息传输的中介，而语言系统对自在环境的反作用也是通过自为环境来实现的。

人群系统是创造语言、运用语言的主体，其中介作用不是机械的、僵死的，而是能动的、积极的。不但能把自在环境的各种信息经过筛选加工之后传输给语言系统，而且还能通过言语运动反作用于自在环境。³作为基本素质之一，人的语言能力是人的智能发展的基础和手段，人在获得语言的同时通常也会获得其它素能的提升，尤其是众多隐性的能力，语言是人获得发展能力的聚像代表。网络符号语言的创造和发展，就是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产物。

人的发展是解决其生存困境的核心要素。贫困问题终究是人的发展问题，贫困状态的体现对象为人，改变客体也是人。人是社会结构中的劳动力，是作用于自然客体的主体。人的学识、技能、品格、交际能力、应变能力等综合素质对于贫困状态有重要影响。人的能力和素养影响着人的经济决策。如 1978 年的小岗村，¹⁸ 位农民顶着压力，冒着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由此拉开了经济发展的序幕。

（三）隐蔽性

语言价值通常附着于其他要素而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作用，尤其是对人的以语言能力为核心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语言与经济的相互影响存在于外生态系统里各因子的交互作用中，两者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存在一定的距离，因而贫困与语言间的生态运动存在隐蔽性的特点，体现在语言对贫困的作用力具有间接性、时间性和成本性上。

1. 间接性

间接性主要体现在语言对贫困的作用力并非是直接的。语言具有一种心理属性，与沟通、认同、信任、文化等有着较强的关系，同时也具有载体属性，与信息获取和技能学习相关。语言对经济的作用往往需要与其他要素结合，通过人力资本、信息技术等对经济产生影响。改善贫困有多条路径，但每条路径都可以找到语言的影子，语言潜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语言在扶贫脱贫事业中是一个“非紧迫性因素”，但提升语言能力对提升经济的发展具有间接的重要作用。⁹

2. 时间性

语言与贫困生态运动的隐蔽性还体现在语言投资的回报具有时间性。语言对经济的影响是一个“多阶段传导”的过程，其作用是隐性的，很难测度，且需要一定周期才能显现，因而往往容易被忽略。¹⁷语言生态系统间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不是一

蹴而就的，语言能力的获得需要时间，语言能力渗入经济变量中也需要时间，其作用的凸显同样需要时间。如个体对一种语言的掌握需要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语言才会对收入产生影响，语言变量必须积累到一定规模才会对经济变量产生作用。¹⁷但语言的提升可以对个人的综合素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融入主流社会文化，融入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都有很大帮助。可以说，语言的提升对经济的发展是一种长久助力，有利于提升发展理念，优化发展模式，从而增强生态发展的可持续性。

3. 成本性

语言对改变贫困虽有收益性，但也有成本性，其成本性可以对语言的价值造成一定的隐蔽性。贫困人口在发展经济时面临着众多的选择，贫困的处境所造成的资金、心理“负荷”的叠加无形中会放大语言投入的成本。毕竟语言对贫困的直接性影响较弱，且见效缓慢，使其收益性容易被隐性化，甚至在表征上体现为一种消耗品。比如脱贫工作的目标是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相比于其他脱贫方式，语言脱贫不易被群众所接受，因为语言脱贫投入成本高，需要付出时间、金钱和精力，但产出一般比较慢，不像经济产业那样能比较直接地产生经济效益。

二、语言与贫困的作用路径

任何生态系统的存在都必须依靠系统内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语言内生态系统通过三要素交换实现与外生态系统相关要素的相互作用。语言对贫困的作用伴随着这些要素而进行，语言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分别承载着语言的表达、交际和审美功能，并对贫困产生影响。

（一）物质循环

物质循环是生态系统最基础的功能层级，人类发出语音的过程也是一个物质运动的过程。³语言作为一种物质资源，常以语音和文字为基本表现形式，发挥着语言的一种原初功能，即表达功能。语言的物质流是其能量和信息传递的载体。以语言为物质载体的相关经济有很多，任何经济交往行为都离不开语言。

首先，语言本身即作为一种资源，可以作为物质循环的生产资料。从文字、语音、词汇到语法、语义、语用等，语言各个要素都参与到了经济生产过程，甚至可以独立为物质产品，如书信代写、语言广播、语言翻译、语言培训、语言康复，各类语言学习音像、考试资料，以及语言要素与科技结合而形成的电子书、电子词典、复读机等。语言要素资源是语言经济的物质基础，可以产生直接性的经济效应。

其次，语言作为一种劳动服务载体，同样具有商品价值，参与经济发展的物质循环，如餐饮、旅游、医疗、银行等领域的语言服务。语言虽然可能不是产生经济效益的直接商品或主要商品，但却是商品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了商品价值的构建。在这里，语言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物质载体，与其他资源最后结合成为一种经济生产的物质资源。

此外，语言人才也是经济生产的物质资源。作为语言服务生态的中介系统，语言人才资源也不容忽视。我国对各行各业的人才都有很大需求，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下，人才储备机制对国家经济发展往来具有重要意义，甚至有时决定了经济交往的结果。

总之，语言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入生产的物质循环中，最终作用于经济并影响贫困。

（二）能量流动

语言对贫困的作用方式，除了物质流外，还与语言生态的能量流动有关。人所从事的社会生产和物质交换通常是一种交际性经济。能量流就是语言对社会交际的产生和发展所起到的一种影响力和作用力，通过影响人在经济交际行为发生前的取向选择和过程中的体验判断，从而影响经济交际的结果。

从跨国交际来看，语言生态的能量流主要体现为语言对经济交往的外部国际环境的一种作用力，多表现在交际成本的预判和交际心理距离的体验对经济交际的选择和发展的影响上。交际成本影响经济成本，语言通过影响双方沟通交流的效率和质量等，产生一种交易费用的预判，即交易成本评估。语言差异容易使得贸易双方出现信息获取与理解的偏差，从而增加“机会主义型交易成本”¹⁸。当交际成本预算过高，就会产生消极性经济交际行为。交际心理距离的体验也是受能量流影响的重要因素，有时甚至可以决定经济交往的成功与否。在跨国经济贸易中，一般语言越相似，双方的交际心理距离就越近，这种较短的交际心理距离有利于跨国公司管理人员获得人脉，从而获得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

从国内交际来看，语言生态的能量流主要表现为语言对内部社会关系的一种作用力，多体现在语言的文明诚信水平和产业的人文内涵对经济交际的选择和发展的影响上。语言文明诚信是经济交易的基本要求，道德滑坡与语言文明诚信较低有很大的关联。语言的过度扭曲，不仅影响人们正确认知产品，长期存在于这样的语言环境中还容易麻痹人们的道德认知，对国民语言能力 & 文化素养产生负面影响。如当下各行各业的发展日益繁盛、竞争愈加激烈，经济交往中有时会出现广告的过度溢美，这也使得虚假广告逐渐坦然地进入经济市场，甚至还出现了虚假商品，如“有毒奶粉”“漂白稻米”“染色馒头”等劣质有害的产品。语言文明诚信较低往往带来欺骗性甚至有害的交易，在感受到产品的虚假性后，其经济交易的意愿和成功率往往会比较低。与语言诚信相比，人文内涵则是更高层次上的一种经济价值塑造，也同样影响着经济交往的选择和结果。目前不论是教育行业还是其它更加实体化的商业产品生产，大家都逐渐意识到了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产业内在的人文内涵，用语言传递自己的文化理念，树立自己的品牌特色和产品形象，吸引和接受具有共鸣的消费者，在影响消费心理的基础上推动经济效益。

（三）信息传递

生态系统中除了物质流和能量流以外，还有一个高于物质、能量的层次——信息流。信息是物体自身所携带的一种印记。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语言凝聚着各种信息元素，通过反映语言背后的认知、思维、审美等特质传递着相关的语言信息。这些信息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基本性信息主要是字面的客观消息，高层次信息则是一种附加性信息，隐现了表达主体的理念素养和背后代表的群体文化与文明，进而对经济交易的方式和结果产生影响。

基本性信息呈现于语言表达的排列组合中，对经济交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语言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规范性和得体性上。其中真实性和客观性直接影响交易者信息获取的客观内容。在交易中，双方会借助语言增加沟通，期间对传递信息的了解会在交易者心里形成一种对交易内容的判断，进而影响经济交际的选择。规范性和得体性直接影响交易者获取信息的主观体验。信息的表达是否规范和得体会影响交易者的情感趋向。当然真实性、客观性与规范性、得体性所获得的信息观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在影响内容的基础上，会产生一种心理审视，由此也进一步形成一种信息体验。这种体验既可能表现为强化规范性和得体性所带来的心理体验，也可能是一种弱化，这取决于信息流的传递方向是否一致。

高层次信息体现在对表达主体理念素养的信息传递上。语言作为个人思想加工后的产物，带有一定的个人特质，同一事物或同一内容的表达，不同人可能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语言背后传递着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信息，进而会影响个体的经济决策等行为。如 Chen, M. K 认为，不同的语言在语法结构上对时间的强调不同，因此人们对于时间偏好会有所不同，从而影响该国的总体储蓄率。¹⁹如英语、西班牙语更善于强调时间，而汉语则强调动作，所以英语、西班牙语等欧洲语言拥有较强的未来偏好性，因而储蓄率较低。与此同时，语言交际过程也是一种双线交际，在表层明意的同时，还蕴含着深层的思想情感传递。“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语言交际中传递着的深层情感信息，影响经济交际氛围，进而影响经济结果。

作为一种文化载体，语言背后还蕴含着一种高层次的文化信息，折射出使用群体的文明程度，间接地影响着经济增长的路

径。这种深层信息是多元化、多层次的，不同的语言背后是各自文化中无限意象的聚合体，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民族、宗教等多方面。首先，语言背后文化信息的传递透露出不同的交际习惯和潜在规则，所以语言的学习和使用需要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信息。语言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知晓对方语言，可以更好地认识该国文化和背景，熟悉对方不言而喻的贸易规则和潜在的贸易习惯，可以促进经济行为的共识，增加约定与行为结果的一致性，避免理解误差带来的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其次，语言背后文化信息的传递具有交际理解的指向性。简单而粗劣的表层意义传达对交际效果的影响有时是无用的，甚至还是有害的。对语言文化信息传递的不足、偏差甚至错误，可能会产生极大的交际逆化，不仅容易出现误解，甚至在无意中进行了自我黑化，同时也容易为恶性的曲解创造机会。再次，语言背后文化信息的传递塑造了群体形象，并影响了话语权的存在方式。不论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还是提高国家的国际话语权，我们都要重视语言交际中的历史文化信息的传递。尤其是在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交往中，不能仅仅做到表层意义传达，更要关注言语交往中我们的理念是否准确而恰当地传递给了对方。文化信息塑造了国民形象，还影响着话语交际中的框架解读方式。偏误的话语解读容易造成隐形的恶性循环，虽然容易被忽视，但通常危害力是巨大的和难以扭转的。因此，我们在对外交往中尤其要重视深层文化信息的传递，以促进各国在政治上的互信和文明上的互鉴，进而实现经济上的共赢。

（四）机制联动

李国正认为在生态系统中，物质流是基础，能量的流动必须以物质流为运载工具，物质的流动，又需要能量作为动力，而信息流是高于物质、能量的层次，它贯穿于生态系统的各个层级、各个环节，把它们有机地联成一个整体。³因此，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虽然所处的层次不同，却关系紧密，相辅相成。

物质流是能量流和信息流的基础。语言作为一种物质资源，是能量、信息传递的载体，物质流所建构的语言资源、语言产品、语言人才，为经济行为提供了基础的交易商品和劳动力。能量和信息存在于以语音和文字为基本表现形式的语言资源的排列组合中。能量流只有通过物质流才能对交际产生影响力 and 作用力，物质流不存在，能量流和信息流就失去了依托而无法存在。在机制联动中不可能有离开物质流的能量流和信息流。

能量流存在于物质流的基础上，同时为物质流和信息流的存在提供动力。能量流是语言对社会交际的产生和发展所起到的一种影响力和作用力。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力目标对物质基础的需求不同，由此影响语言资源、语言产品、语言人才的存在和发展。与此同时，能量流在对外交往中具有的作用力和在对内交往中具有的影响力，可以优化外部发展环境和促进内部社会和谐，进而为物质流和能量流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动力和方向。

信息流是在物质流和能量流共同作用中存在的一种内涵积淀，可以深化并转化为内在的力量。不论是语言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规范性和得体性，还是语言的文明诚信水平、群体文明程度，都是语言物质流所凝聚而来，并通过能量流的影响和作用力进行传递。同样，信息流的存在也影响着物质流的存在和能量流的发挥。不同文化和文明背景下的语言形式存在差异，文化内涵的表现也影响着语言在经济交际中的作用力和影响力。

语言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进入经济活动的循环中，其各自的作用方式虽有区别，但仍相互联系，共同影响着经济的各个方面和要素，并最终作用于贫困。因此，不同语言所带来的经济效应不同，源自不同时间和空间中语言生态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状态的不同，语言本身并无高低之分，多样化的语言都是语言百花世界中的一朵。主流语言的价值性特别凸显，通常是因为其所承载的信息容量及流通范围与我们生存活动更加适宜，掌握主导语言更能使我们与时代同行而不被淘汰。从历时角度看，我们掌握过去的通用语可以使我们获得典籍史册上的信息；掌握当下的国家通用语，可以更好地成为一国之民与国家发展相融相促；而掌握未来的国际通用语则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成为地球村村民。从共时角度看，掌握方言可以使我们在地方性区域范围内生存和发展，当下的社会发展要求我们走出方言地域。提高国家共同语能力不仅是个人适应当下经济发展以便搭上国家经济快车的需要，更是国民众志成城地共同推进国家发展向前迈进的要求。水舟需共行，“小家”的归属感也需融汇成“大家”的归属感。走出方言的地域范围之后，便是走出国门，与世界对话，这进一步需要我们掌握外语，推广汉语。由方言到国语再到国际通用语，

语言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范围不断扩大和丰富。毫无疑问,在当下经济发展中,通用语是语言中的主流,理应掌握,在此基础上提高外语、保持原方言、学习流入地方言,则是锦上添花,利于提升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数量和质量,从而促进生产要素的流通,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形成高效和谐的市场经济。

三、结语

当下,我国正从过去“脱贫攻坚”迈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发展阶段,更需要我们去正视和思考两者的关系。语言生态系统强调重视语言系统和外部环境系统的相关性。作为一种有机整体,语言系统不仅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还能反作用于外部环境。本文从语言生态视角探索语言与贫困的作用特点及路径,希冀对两者运动关系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语言和贫困各相关因子作用力的联动和叠加,使语言生态与贫困的运动呈现双向性、层次性和隐蔽性的特点。双向性源自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起主要影响作用的因子不相同,各因子间的交互性影响导致正向性和负向性作用力的产生,主要体现在语言多样性与经济发展、语言能力与经济发展、语言权利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贫困体验上。层次性是相对于各系统及其内部间因子的相互作用力而言的,从横向看,体现为影响因子在各系统内的作用路径;从纵向看,影响语言和贫困的各系统间存在不同的级次,这种纵向层次更多的是体现各系统的功能,其中位于基础性地位的是自然系统,位于核心地位的是人群系统,而社会结构系统则是语言和贫困生态运动的动力。

在语言生态系统中,语言内生态系统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实现与外生态系统相关要素的相互作用。语言对贫困的作用伴随于两者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运动过程之中,语言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分别承载着语言的表达、交际和审美功能,并对贫困产生影响。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虽然所处的层次不同,其各自的作用方式也相互区别,但彼此关系紧密,相辅相成,在差异中共同影响经济的各个方面和要素,并最终作用于贫困。因此,不同语言所带来的经济效应不同,源自不同时间和空间中的语言生态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状态不同,语言本身并无高低之分。

注释:

1《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实录全文)》,新华网,2020-05-28,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lh/2020-05/28/c_1210637126.htm。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21》,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78 页。

3 20 21 25 28 李国正:《生态汉语学》,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9、63、164、73、27 页。

4 李宇明:《修筑扶贫脱贫的语言大道》,《语言文字周报》2018 年 8 月 1 日第 001 版。

5 包联群:《语言景观与语言经济》,《中国语言战略》2018 年第 1 期。

6 Pool J.,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language diversity”, *Sociologische Gids*, Vol. 17, No. 2 (Mar., 1970), p. 86~101.

7 Ottaviano, P., G. Peri, “Cities and cultur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No. 2 (Aug., 2005), p. 304~337.

8 刘国辉:《论语言及其多样性的经济价值》,《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1 期。

-
- 9 22 王春辉:《语言与贫困的理论和实践》,《语言战略研究》2019 年第 1 期。
- 10 张先亮:《从新型城镇化角度看市民语言能力》,《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3 期。
- 11 陈媛媛:《普通话能力对中国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经济评论》2016 年第 6 期。
- 12 金江、尹菲菲、廉洁:《普通话水平与就业关系的实证检验》,《制度经济学研究》2017 年第 1 期。
- 13 14 16 方小兵:《海外语言与贫困研究的进展与反思》,《语言战略研究》2019 年第 1 期。
- 15 Skutnabb-Kangas,T. “Linguistic human rights and teachers of English” ,in J.K.Hall,W.G.Eggington (eds.),The Sociopolitics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2000,p.22~24.
- 17 18 李小云、屈哨兵、赫琳、党国英、袁伟:《“语言与贫困” 多人谈》,《语言战略研究》2019 年第 1 期。
- 19 Williams,F. “Some preliminaries and prospects” ,in Frederick Williams(ed.),Language and Poverty: Perspectives on a Theme,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0,p.1~10.
- 23 24 王海兰:《国内经济学视角语言与贫困研究的现状与思考》,《语言战略研究》2019 年第 1 期。
- 26 张卫国、孙涛:《语言的经济力量: 国民英语能力对中国对外服务贸易的影响》,《国际贸易问题》2016 年第 8 期。
- 27 Chen,M.K. , “The effect of language on economic behavior:Evidence from savings rates,health behaviors,and retirement asse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3,Vol.103,No.2(Apr. ,2013),p.690~731.